



一九九七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六辑

诗探索

《诗探索》是中国唯一的诗歌理论
辑刊，是诗人，学者探索与争鸣的讲
坛，是诗歌研究与创作者的必读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室

主 办

四川矛盾实业总公司
画家石虎先生

资 助

诗 探 索

1997 年第 2 辑(总第 26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1997年 第2辑/谢冕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

ISBN 7-5004-2121-4

I. 诗… II. 谢…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期刊
IV. 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1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承办 《诗探索》编辑部编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5.50 元

目 录

存在的巅峰或深渊:当代诗歌的精神跃升与再度困境

..... 张清华(1)

· 纪念邹荻帆 ·

诗心·诗人·诗情 邹海岗(13)

——纪念父亲

邹荻帆:他的诗魂与球魂..... 杨匡满(19)

邹荻帆论 高秀芹(26)

·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

汉字文化与汉语思想 王岳川(37)

——兼论“字思维”理论

汉文与诗歌的现代性 章 燕(51)

字思维与诗美创造 洪 迪(61)

· 诗坛态势剖析 ·

反思与拯救:90年代新诗写作 老 杰(68)

· 诗学研究 ·

刷新经验:诗歌对往昔的重构与提升..... 蒋 林(77)

语言:指向纯粹..... 邱正伦(85)

· 女性诗歌研究 ·

李琦论 林 莽(93)

倾听:断裂与动荡	沈 奇(103)
——阎月君论	

· 诗人谈诗 ·

“人诗”和“诗人”	晨 声(115)
春天还很遥远	孙文涛(118)
抒情诗人的命运	刘漫流(124)

· 关于王小妮 ·

王小妮的光晕	徐敬亚(127)
1996 年笔记	王小妮(149)
王小妮创作简历	(152)

· 青年诗论家研究 ·

天使镜象:作为诗论家的程光炜	毕光明(153)
自我改写的写作	张清民(161)

· 诗通讯 ·

关于四川 40 年代《学生报》的通信	木 斧(171)
古诗今译的文化价值	叶伯泉(173)
以小抗大的当代讽刺诗	陈显荣(179)
《坚守现在诗系》研讨会述要	何足道(183)

· 外国诗论译丛 ·

威廉·布莱克与想象力	[英]叶芝著 黄宗英译(184)
------------------	------------------

存在的巅峰或深渊： 当代诗歌的精神跃升与再度困境

张清华

从所在境界与精神品位上说，当代诗歌的主题衍化经过了四个层面的爬升，这四个层面依次是生活——生命——生存——存在。“生活”，指的是那些较靠近“现实主义”的世俗抒情主题，“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斗争”这些昔年的诗句本身就生动地标明了生活主题时代诗歌的特征与水准。“生命”，是指人本主义立场上的生命感怀与精神抗争，在新时期伊始，这一主题曾是朦胧诗人和“归来诗人”最重要的抒情内容，顾城的《生命幻想曲》、舒婷的《神女峰》、江河的《我歌颂一个人》、北岛的《雨夜》、艾青的《鱼化石》、蔡其矫的《祈求》等都是典范之作。之后，由个人到群体、由当下到历史，由呼喊生命的尊严权利到探讨它与历史人文的关系，便到了“生存”主题，概言之，“生存”即是指那种体现了对文化与历史的追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患的主题，这一主题经过了一个由偏重于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到偏重于对当下人类与社会生存状况的揭示的转变与过渡，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诗歌”可谓前者，后期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以及“新乡土诗派”等可视为后者，而这时期持续存在发展的“女性诗歌”可以视为横跨“生命”与“生存”两个主题层面的诗歌现象。“存在”可谓是最最后一个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它是从历史和文化体验中进而抽取提炼出来并回归到个体自身的关于人的本质与价值的追问，它表现为哲学、宗教和神话的合一，是对普遍而具体的存在着的世界（存

在者)和人的本质及生命意义的假定、寻找和描述,是信仰的颂辞和当代哲学的艺术着妆,是以神祇的名义对上述假定情境与意义的肯定、命名和回应。海子以及从“第三代”诗人中分离与成长起来的个体写作者们,基本上都处在这一层面。从历时角度看,这四个主题层面的不断衍化确实正是当代诗歌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当代诗歌的精神品位与主题内蕴的不断提升正是源于这种衍化本身所产生的动力。然而,这也是阶段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当历史业已完成了某种必要的提升和变革时,就不应再将这一单向度的推进本身视作一种神话。就当前诗歌的状况而言:“存在”这一为写作者哗然骚动、趋之若鹜的哲学命题既给诗歌主题带来了整体的拔升,同时也潜藏了困境,本文将就这一矛盾,尤其是“唯存在主题论情结”所具的负面效应做一简略分析。

毫无疑问,存在主题给当代诗歌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好处。在80年代中后期,当诗歌走入文化(历史)与“反文化”二元对立的困境进退两难无法自拔的时候,“非非主义”诗人对语言症结的发现为诗歌打开了一条通向存在哲学的通道,但对这些诗人而言,这种结果则是他们不自觉的,他们仍停留在一种超越文化的历时蒙尘的“前文化”情结里,这种理想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神话,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验意义。而此时,另一些更富有才华和悟性的诗人则卸去了历史与文化的浓妆,通过存在主义哲学的启悟而逼近了世界和人的某些共时性(存在)的本质,从而结束了一个关于历史范畴的精神对抗时代,他们在表面上极为朴素的写作中出人意料地达到了逼近世界“本源”的境界。大地的溶解和神灵之光的映耀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空前的深邃、神秘、博大、原创、本真和澄澈之境,尽管他们当中的先导人物海子等人在其原创意识上也许并没有十分成熟的自觉——或者说,与其认为他是在自觉中发现了这一灵境,不如说他是在无意中看见了世界在“刹那间向着存在的敞开”的缝隙,看见并借助了那缝隙中透下的一缕光线的启示和引领——但是在对当代诗歌精神境界的指引

上,他却起了关键的作用。来自大地、自然、劳作和女神的灵感和激情使这些文化的西西弗斯们由艰苦的社会写作,回到了个体的体验之中,成为沉思着的“栖居者”和作为个体的“言说者”。另一方面,在经历了精神挫折之后,彻底放弃历史批判的启蒙立场和逃避当下话语情境,而代之以对个体精神的抚慰与抽象价值的关怀和叩问,便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从关怀社会的立场退守到自然个体世界;从有倾向性的文化价值评判到取消所有二元对立的对“终极存在”的哲学命题的探寻与追问,在社会空间上做出了重新自我定位,在退避中守住了自我,同时,由于“存在”之境对历史文化之境的更具抽象与深奥意义的超越,诗歌在社会立场的退避中又获得了相应的“提高”与“进步”,这就注定了这一转折在广大诗人意识中的“合法性”。给他们以极大的安慰与支撑。而且,在关怀社会和历史被证明为无望和无益之时,他们还为自己假定了另一更为虚远的关于“人类生存的忧患”的主题;并据此而书写了一曲关于土地、生存、劳动和庄稼的慷慨悲歌,90年代初期,关怀个人的存在主题与所谓“新乡土诗”共同构成了一度相当“雄壮”的交响。

存在主义或者说是“唯存在论”主题情结的出现,除了在当代中国诗歌内部固有逻辑的决定因素和特定的外部社会条件的影响之外,实际上更具有来自存在主义哲学本身的作用。在人类的哲学史上,或许只有存在主义哲学才这样接近于一种类似于诗的体验的“玄学”(当然中国传统的玄学和禅宗思想也近于诗,但它们更倾向于在消释和缄默中感悟与品味,而不是具有哲学命题和思维特征的追问和言说)。尤其是海德格尔,更将这种哲学的求索追问同诗联为一体,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本身就是“存在的创建”,除非通过诗性的言说,无法逼近和揭示存在的真理,而他所借助和使用的言说方式,事实上已是一种诗性的话语,在他言之,存在是“不能通过定义法”和“概念”而“推出”的,“存在是自明的概念”,但又是“最晦暗不明的”^③,语言甚至会“遮蔽”存在的澄明,因此他引述荷尔

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以此来说明人的“存在”状态，他甚至自己干脆就采取了诗的方式来表述：“世界的晦暗从未趋近/那存在的澄明……//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只有成形的意象才能保持在视野/但成形的意象安身在诗里”。“歌和思是跟诗紧邻的/两个家族//它们源自并且达于/存在的真理”。^③这样的观念之于当代中国的先锋诗人而言，不啻是打开了黑暗中通向光焰四射的天国中的一扇窗户，况且海德格尔还直接阐发了同揭示“存在的真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在《诗·言·思》中揭示了作为存在居所的语言同思想和诗的共在关系；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之中，揭示了诗歌本身同大地和神祇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和通过“大地”与“神祇”的载体与映耀而接近存在的途径；在《存在与时间》中则揭示了生命的有限性同存在的“敞开”的关系，为诗歌由其最基本的抒情活动——生命悲剧体验通向对存在真理的揭示搭起了哲学桥梁，所有这一切都给90年代以来的诗歌注入了思想动力。因此，关怀于个体生命体验以及所谓生命存在的本质的抒情写作成了一个最具热度和时髦的主题。

不言而喻，当代诗歌在80年代后期以来已达到了它历史上最高的思想水准，这一点在许多先锋评论家笔下都已有过描述与评论，但在我看来，仅仅看到其成功和进步的一面是不够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片诗歌的乐园，一片坚厚而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深渊，一个虚空和苍白的风洞。

“神示”的空洞与虚无是这种主题倾向首先无法规避的困境。所谓“神示”，在诗歌中实际上是指写作者所抵达和居守的一种心境，如果诗人仅停留于世俗个体的此在，就无法感受到一种超越和必然的力量，而诗人在越出存在者的蜃壳而游向永恒和必然的灵境的时候，会感验到一种先在的“神性的光耀”，神的是否“在场”，决定了诗意是否能够具备超出世俗经验而抵向“存在真理”的品质与力量，因此，诗人必须以一种近似于宗教情感的立场进入诗歌。

怎样抛开世俗的经验并接受神圣的光耀？一方面要诗人在内心世界中努力提升自我，另一方面还要使自己言说的语境具有某种神启意味，而事实上这一切均来源于诗人的信仰假定。简言之，当诗人拥有足够的坚定信仰和体验能力看到“不言自明”的存在，并因之而产生倾诉和言说的激情时，“神示”才可能产生，反之，一切仅在言词上存在的“神祇”都只能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虚影。然而即使是前者，也会陷入一种极点式的困境，海子之所以最终走上了殉身之路，除了性格原因、心理背景和某些直接的生活诱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一种精神的高度疲惫，当海子愈加在一种神圣体验中逼近那种“存在的真理”并为之激动不已地写作的时候，现实与幻境的落差就愈使他陷于心灵的分裂，最终他不得不通过殉身来实践他的宗教情怀，并完成他的充满神圣意味的创作。由于他的死，他的作品也得以被神圣之光照亮。海子的创作与人生实践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只有以彻底绝决世俗的宗教般的决心进入诗歌，才能真正通过它而体验到那由神的在场所决定的“存在真理”的存在，同时，一旦如此，也必将会导致诗人精神的危机，因为对存在的不断追问只能导致诗人对世界与人生的虚无主义认识，在坚定的信仰、追寻的欲望和事实上的虚无之间，诗人要抗拒心灵的危机与精神的崩溃，只有以死解脱，许多当代诗人的自杀和生活悲剧都具有这种内在原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死亡——这种牺牲式的自杀方式，才能在瞬间将生命燃成永恒的神圣之光，将自己的作品作最后的超度和提升，使其具有神性光彩。但是我们事实上又不可能要求所有诗人都去自杀，所以神示的空洞最终便成了廉价的时髦，在许多青年诗人那里，营造某种神祇的影像或神话式的语境便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关于土地、女神、存在、神殿、村庄以及某些历史文化遗址便反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他们密度最高的意象群落，而在场、缺席、在世、遮蔽、澄明、晦暗等等这些海德格尔式的术语也便成了他们阐释自己作品和艺术追求的最常见的词语。但是一个根本的矛盾仍然横亘其中，即，这些言说

本身的执着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证明是苍白和空洞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内部精神世界而是源于语言的装饰，尤其是当人们将此与许多青年诗人十足世俗的生活相比照，它们甚至还构成了某种可笑的“自我反讽”状态。

上述困境可以视为我们的一个对以诗歌形式追问存在的存在者的追问。撇开这个问题不究，近年来先锋诗歌对存在主题的热衷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困境，那就是对现世的疏离和对原有诗歌的人本主义立场的背叛。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是关于个体生存本质与意义的诗性探究，而 19 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诗歌的两大主题却是对社会的批判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这两大主题所对应的是对大众生活的悲悯、同情和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患，就像本雅明所称赏的波德莱尔诗中频繁出没着“人群”、“大众”一类字眼一样，对大众生存、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的关怀成为它们主题的主要支撑。即使是在当代西方诗歌中也仍然充满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人性的张扬（如金斯伯格），对祖国文化中伟大的人文传统的感验、复活和颂赞（如塞菲里斯、埃里蒂斯），对社会正义的坚信与颂扬（如夸西莫多、布罗斯基）。从本质上说，他们的作品都不能算是纯粹个人化的抒情。对当代中国的诗人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存在主义”立场，更需要人本主义和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良知和批判精神，而这些正由某些先锋诗人对“神性”、“神启”、“存在真理”的过分强调与推重而被削弱。因为尽管从表面上看先锋诗人的作品大都还以“民间形式”存在着，但从实质上看他们已经具有了某种“权力地位”，他们的导向对整个诗坛方向的影响已举足轻重。或许仍出于某种一维的前指性的“先锋”情结，他们的理论视野和艺术追求都过于狭窄，他们所强调的“纯粹”已陷于单调和苍白，他们的抽象与哲思已变得空洞面不可思议，他们从博尔赫斯、佩斯、帕斯等人的诗中所读到的更多的是个人化、语言和技术性的东西，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冥想。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几年前为诗人周伦佑所批评过的“白色写作”的继续。“白色写作”不是指哪一个诗人或哪一些

诗作，而是指一种趋向，它把“纯粹”视同于“中性”，“把闲适与纯粹混为一谈，以为避开忧患、深度、绝望以及存在的全部尖锐性，诗便纯了”，他们“把写作当作一种逃避行为”，逃向田园、山林……^④这种写作回避了严峻的现实和诗歌应担负的良知与道义的责任，据此，周伦佑提出了他的要求诗人敢于直面血色人生、社会罪恶和诗人当下生存境况的“红色写作”的口号，然而这一倡导在近几年的诗歌中仍然收效甚微。像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那样的对一个时代的深思与总结的大气磅礴的作品可以说是寥若星辰，而到处弥漫的则是关于死亡、时间、性以及抽象化了的自然形式的反复描摹。我无法否认这些诗在深入人类经验、心灵结构、存在之思以及在苦苦探寻其言说方式、探寻突破黑暗遮蔽的言说过程中所达到的空前的深度，它们作为单个的艺术品存在都表现出极为成熟和精致的艺术水准，但也正是这些作品整体上形成了今日诗歌的苍白的状态。由生存进而发展到存在，意味着诗人已逐步放弃了倾向性的介入与精神上的抗争的立场，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立场的一个必然的悖论。周伦佑所倡导的“红色写作”说到底实际上是要求诗人从存在主义这一先验与形上的玄思立场退回到脚踏现实苦难、笔指当下生存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出于上述所说的先锋诗人的一维前指性的“时间神话”情结和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他并没有明确认可这个悖论，相反，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使用存在主义关于语言与存在、遮蔽与澄明的概念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可以看出唯存在主义主题情结给诗歌自身和诗人的思想倾向、思想方法所带来的悖论。

另一方面，存在主义立场还导致了当代诗歌的一个唯语言论情绪的自我困境。这一困境尽管不能直接归咎于存在主义理论，但却是它的一个“副作用”。海德格尔是以几近于玄学的方式来理解语言的。在他看来，语言事实上早已先于我们对存在本质的追问而存在了，如同“存在即存在”一样，他在给语言定义时也使用了“语言即语言”这样的解释。两者都是先验的，当人在追问世界的本质、

甚至语言自身的本质的时候，他早已在使用语言了。“不管我们如何就语言的本质进行提问，语言必须先行把它自己赐予我们。因此，语言的本质就成了语言本质性存在的授予，就是说，语言的本质变成了存在的语言。”^④语言在被人言说的时候，有两种情形，即“遮蔽”和“澄明”，当它通向和揭示存在的时候，是澄明的，反之则是一种遮蔽状态。因此，语言实际上便成了“存在的居所”，对能否揭示存在的真理具有直接的作用。由于海德格尔的启示，当代的先锋诗人都把语言放在了写作的首位，这无疑是积极的，对于整个当代诗歌艺术的提升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然而海德格尔的一系列关于语言及其和言说、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完全是一种纯粹哲学本体论的观点，且具有形上的冥想与体验特征，对于诗歌写作过程中的语言操作并无多少直接的指导作用。而把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奉为圭臬的先锋诗人们则千方百计地将这些至理圣言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对事物的言说的“澄明”欲望使他们变成一些语言的自恋癖者，言说变成了语词的游戏，变成了一种纯粹体验中的自述，变得反复絮叨、冗长繁缛，变成了喃喃自语，“遮蔽”却变成，写诗变成了一个纯粹语言学的活动。试读周伦佑的一首《想象大鸟》中的句子：

.....

鸟是一个比喻。大鸟是大的比喻/飞与不飞都同样占据着天空
/从鸟到大鸟是一种变化/从语言到语言只是一种声音/大鸟
铺天盖地，但不能把握/.....直接了当的深入或者退出/离开
中心越远和大鸟更为接近

我无意压低这首诗在语言上的刻意的思辨式风格，它也并非没有意义，但这样的诗和周伦佑自己所倡导的“红色写作”相去甚远。再如唐亚平的一首《形而上的风景·八》：“纯粹的树/无花无叶无果/.....诗人，你而壁而坐/你说，你做什么//用语言赞美语言/用语言消化语言/用语言创造语言.....”，这种言说甚至成了诗人对自己言说过程本身的一种描述，这类作品在先锋诗人的作品中实在是

太多。描述得特别严肃和富有力量的是陈超，他的《诗歌写作·空无与真实》中的句子：

但是诗歌！纯洁的恋字癖，青春的症结/……瞧瞧，是谁惊
慑于单字或词素本身/的硬度，把它们从超员的病房里/一个。
一个。拎出来！/母语的荣耀垂直洞开……/当语言纷纷坠落
时，用力撑住，提升它/深入一种火焰，在它的核心坚持凝冷/
而当言语燃灼扭曲时，用力抵住，锻直它/这就是写作！……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先锋诗人对语言自身执着的探寻精神和超凡的创造才能。但当这样的言说方式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语势套路的时候，大量的作品在事实上不但没有将我们引向澄明，相反可能在一种繁琐而有趣的语言游戏中将我们引向另一种隔膜和遮蔽。“对语言的挣脱”完全是相对的，如果沉入一种反复连绵的语势并自得于这种“挣脱”过程时，操作也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耽溺于言说过程中的机智，情感的倾诉便成了一种花哨的语言表演。

唯语言论情结的另一个悖论表现在语词运用和语感的单一化、趋同化和“流行病化”上。海德格尔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曾专门论述过“大地”和“神殿”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大地是万有的源泉和存在的寓所，万物对大地都有一种“归属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自足的仪态和自我归闭……它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将自己揭示出来”。而“神殿”作为一种“场所”对艺术作品有一种“聚集”作用，将作品收拢到它的神性之光的照耀之中。另一个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卡西尔更进一步指出了“神祇”与“语词”之间的关系。语词（逻各斯）为什么在艺术中会具有某种“魔力”，那就是因为言说者汲取了“神的存在和意志的力量”，因为“神名似乎才是效能的真正源泉”。^⑤在海子的诗中曾大量出现“大地”、“魔法”、“王”、“祭司”、“太阳”、“火光”、“女神”、“村庄”、“天堂”、“家园”、“麦子”等等语汇，以及关于自然本源事物（如草原、雪山、水、岩石、鲜花、星辰……）的大量语象，这类词语的确具有神奇的力量，它们

使海子的作品充满原创色彩、神秘气息的超越的魅力,如同某种神圣的仪式,庄严、朴素、高迈、空灵。可以说,它们体现了所谓“神的在场”给语言、语境、语意所带来的神奇的激活作用。这一语言的“魔法”当然也为许多诗歌写作者所发现和模仿,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看见了所谓“新乡土诗”中“麦子”、“女神”、“火焰”、“村庄”、“庄稼”、“家园”、“洪水”等等语象的蜂拥泛滥。这其中许多质量平庸的作品并没有意识到,在通往存在彼岸的界河中,仅仅有这些散落的沙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诗人必须有超越存在者即世界表象而逼近世界本源的体验力,这才是真正的桥梁,仅靠词语本身并不能最后形成神圣和超迈的语境。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后起的先锋诗人对海子,对存在主义哲学观、语言观的认同,也导致了他们在表达上个性的匮乏。他们或者模仿某些翻译作品的句式风格,或者互相模仿,共同制作某种流行的语调,使那种沉吟、默辨、反复叹唱的句式,甚至包括其续句回转或突然予以切断的方式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由于这一点,尽管众多青年诗人修辞能力已经相当出色,但在实际效果上却造成了缺少个性和区别的单调与苍白。另外,体验多于命名,整首诗所构成的姿态是诗人独自对世界的言说,而不是通过听众的共同经验,所以这些作品的深度反而被自身的晦暗和繁琐所消释。有力的命名是个性和创造力的体现,而命名除了具有独到发现,还应与听众的共同经验相接通。海子的诗之所以荡人心魂,是因为它唤起了人在意识深处那些原始的生命经验(以儿童时期形成的经验为原型,以童话、神话的语境为负载,以哲学的形上与简洁方式去言说),所以尽管表面上体验的因素居多,个人的色彩尤重,但天才的命名力却蕴于其中。而且由于他的殉身,这些作品已随之增值为经典,其命名的“权威”力量就更加被强化。而众多追随与模仿者,则缺少这两种内在力量,因之显得浮泛苍白。

体验的言说方式还导致了先锋诗坛整体上的一种“疲软的抒情”状态。在80年代中期,人们曾感受到“文化诗歌”中知性写作的

单调,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烛照则重新打开了人的个体与存在永恒之间的通道,生命的激情在这里洞开,“抒情的复兴”也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由于个体的言说立场不同于以往代表民族或抽象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人的立场,内心的抒情便成了大家共同采用的方式。尽管存在主义不论在哲学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角度都具有极大的“知性活动”特点,但个体立场却导致了诗人在言说时的一种渺小、脆弱的感伤,因此,此岸的“真理”比之存在的绝对真理也变得缺少内容与力量。诗人的心灵变得敏感而弱小,抒情也必然随之软弱而疲惫。

还有一点应指出,存在主义哲学所引导的回到个体的写作既为诗歌的真正复兴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使它将自己流放到了社会与艺术的边缘,这也是一个悖论。真正优秀的个体写作固然不会最终被埋没,但作为写作者其命运却是悲剧性的,在商业语境时代尤其是这样。写作的个体化必然会导致阅读的个人化,而商业语境中的个人阅读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社会力量?一首真正优秀的诗篇也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起到其应有的、应担负的正义和批判作用;而对更多的作品而言则更只有自生自灭了。在这样的情境下,诗人对世界、情感、存在真理的言说只能成为个人的精神历险(甚至连个人的精神历险也谈不上——只是语言历险和游戏而已),它无碍也无益于社会,而只是诗人自己的存在证明罢了。这样一个悲剧虽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存在哲学,但它所引领的个体写作倾向却结束了社会性写作与阅读的时代,并悲剧性地遭逢了一个充满物质与欲望黑暗的初期商业文化时代,这个具有魔鬼一样瓦解力量的时代,早已使一切精神的挣扎陷于徒劳。

至此,本文对存在主义诗学所引导下的诗歌精神及其内部构成的各种悖论作了分析。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无意批评存在主义的诗学本身,而且还必须指出,正是存在主义诗学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真理果能全无遮蔽,那它就不是真理了”。^⑥何况绝对的真理永远是抽象的,存在主义诗学也不可能

解决一切问题。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商业背景中，回到个体在最初的一刹那也许具有某种“绝决的悲壮”，甚至挺身死亡的壮举也已并不罕见，但这毕竟不能构成唯一的立场，同时也不是诗歌与诗人生存的出路。在我看来，从存在这一终极性哲学立场上的适当的“后撤”，以人本主义与文化批判立场作为其支撑则是可行的。一些小说家如张炜已采取了类似的撤退，从其《九月寓言》到《柏慧》、《家族》，表明作家完全可以从关于生存与世界本源的哲学玄思回到当下语境，以具有传统价值意味的人本主义精神原则对当代文化与人性的状况进行分析与批判。何况，在存在主义哲学王国中的精神玄思和高蹈式抒情毕竟也不能持久地保持诗歌和诗人自己的生存活力。因此，力避在一味追新求异的进化论神话中陷于“皇帝新衣”式的痴迷，力避群起摹仿、浮泛，力避无益的感伤，而力求从“存在”的绝对真理与“在世”的社会正义中寻求双重的力量，才是使诗歌保持不断发展的正确出路。

1996年3月22日

于济南舜耕山下

①②④⑥均引自邵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

③周伦佑：《红色写作：1992年艺术宪章或非闲适诗歌原则》，《非非》复刊号。

⑤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

（责任编辑 陈旭光）